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四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二一期（zk2002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动乱年代】	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上）	周孜仁
【往事非烟】	“一打三反”亲历记	王裕群
【拒绝遗忘】	不可重踏历史覆辙	印红标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动乱年代】

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上）

· 周孜仁 ·

〔作者说明：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作者即将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的书稿《云南文革史稿》。应“文史讲堂”之邀，将部分内容删削整理，成此讲稿，故所引史实均未加尾注。〕

1、循吏

按照中央文件定义，云南“新生红色政权”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云南“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

要说清云南文革，必需先说清两位云南文革的“反派”主角：阎红彦和赵健民；现在先说阎红彦，稍后再说赵健民。

阎红彦，陕西子长县人。16岁造反起家，参加中共，与著名陕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一道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创建人。正是近代中国危机迭起、群枭争雄的时代。这几个陕北汉子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的猛将骁兵万里南来，如果不是历史恰到好处地赐予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机遇，阎红彦和他造反哥儿们的故事充其量不过前辈老乡李自成、张献忠300年前啸聚的再版而已。幸运的是，上述所有的偶然成全了这个陕北后生：历任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刘邓大军入川，先后任川东行署主任，四川体育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共产党英才辈出的官僚群体中，他能力相对平庸；其次，他自知非干臣能吏，素少政治野心；最后，他安于命道，与左右相处谦和，直到50年代末，才因一次偶然原因，终得以封疆大吏之尊派赴云南，官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阎红彦这个老资格，何以年届50方才修得正果？有一段历史公案必须加以说明。

同为陕北红军创始者，阎红彦与高岗素多不和。1942年延安整风，高岗已当上西北局书记，他找阎说陕甘根据地“是子长（谢子长）、志丹（刘志丹）、你和我创建的”，他要阎为此说作证，阎不但不赏脸，还揭老底说：“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清楚。某次战斗，你火线当逃兵，按纪律，抓回来是要枪毙的，队委会考虑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了你留党察看的处分。”高岗恼羞成怒，连称“造谣、陷害”而去。

中共七大，政治才干和官场手段远在阎红彦之上的高岗大获赏识，不仅当选代表，还被提名为中委候选人，阎红彦认为此议不妥，找到刘少奇、任弼时等力呈异议，事情无果，反遭批评。结果是：高岗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政治局委员。阎气得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告状，说“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阎还当面将其状告中央事面告高岗。二人再结梁子。

1945年7月，中央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康生正式宣布高岗是西北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两个月后，阎红彦被派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任副司令，当了邓小平部属，从此脱离了陕北的是是非非，也远离了最高层领袖的视线。

阎红彦被重新引人注意又过了许多年。1954年2月，高岗成了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反党集团”：“高饶反党集团”头子，自杀身亡。其中吊诡，熟知中共党史的人耳熟能详，此不赘言。

与高岗大起大落相比，阎红彦的日子过得实在平淡无奇。他一直以行署主任和军区副政委的身份奔走于川东穷山恶水，默无声闻地组织土改、剿匪、征粮……如果不是高岗阴错阳差摊上大事，谁也不会继续注意阎红彦这个平庸的陕北汉子。

高岗自杀次年，中共第一次授衔，早已从事地方工作的阎红彦，和乌兰夫、叶飞等中共历史上有特殊表征意义的老资格，一起破例被授予军衔，贵为上将。又3年，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阎红彦身高1米8几，毛泽东在一律藏青色干部装的臣僚中见这位大个子，于是宽容大度地抱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阎则恭恭敬敬回答：“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没有意见。”那一年，他49，正式回到毛泽东视线之中。第二年8月，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被领袖一巴掌从云端打落。国防部长换人，总参谋长也换人，公安部长罗瑞卿补位；公安部长缺位，谢富治补位；谢富治系云南省委书记，滇省委书记缺位，阎红彦遂调任了第一书记。

中国历来将官吏类分为循吏、能吏和佞臣。所谓循吏，司马迁的定义是：“奉职循理”。以宽政得人和民安，执政能力强弱则不那么重要了。云南远离中心，经济文化落后，对全国大局影响甚微，中央对边地的唯一要求就是稳定、稳定、还是稳定。执政官员只需老实、忠诚就行。阎红彦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长期担任闲职，如今要以封疆大吏之身独当一面，阎红彦心里不踏实。初接任命，他曾找老上司、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叫苦，说自己“党内斗争总是失败者。”，按“水平”和“性格”怕难担此重任！邓回答很痛快：“我是第一次听你说‘怕’字！”邓要他“从实际出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除了对自我能力缺乏自信，还有一问题让阎忧心：前任谢富治主滇极度左倾，都说云南落后，偏偏“大跃进”“放卫星”搞得民不聊生，饿死人的现象公然领跑全国。还在1958年6、7月，浮肿病便开始在曲靖，玉溪等10个专州70多个县、市大面积爆发，官方统计，截至8月20日，全省发病人数已达23·6万多人，死亡3万4千人。其中曲靖地区死1万9千；玉溪死1万零62。省委农工部调查粮仓陆良县茶花乡后给省委写报告：说茶花乡9510人，肿病2946，死1594，最严重的第四社，1089人死272人，死亡率为25%！开始死人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后来用席子卷走了事，再后来没人抬了，就用牛车拉，一车拉三四具尸体，到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一丢了事。省委书记刘卓甫给省委报告说，曲靖专区病情严重时，已出现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的惨祸。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

前任此类作派阎红彦早有耳闻，并不陌生，任职四川期间，他就对“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深恶痛绝。问题是：如今庐山风暴未歇，彭德怀正遭狂批，全国还得持续“大跃进”，按此套路，封疆吏怎能扭转南疆乾坤？阎红彦再找彭真叫苦：“我和彭老总的看法是一样的，当前又主要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个时候，要我去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怕不合适吧！”彭真知道阎的肚子疼，替他作切割，说：“他是他，你是你，那是两回事！作为领导干部，说真话，讲实情，干实事，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

1959年9月，云南这块烫手山芋正式传到阎红彦手中。

中国为官之道，无非四种：

1、不说所做（懒把式）。尸位素餐，诚然安全无虞，但射灯永远照不到头上，难有升迁之机；2、只说所做（假把式）。只要巧舌如簧，又遇上司喜人吹拍，往往一路春风；3、只做不说（笨把式）。在政治风险极高的极权环境，只做不说，当属有社会担当之稀缺物了；4、又说又做（好把式）。既干事，又会宣传自己，可算官中极品了。

阎红彦属于第三类。他懂得中共游戏规则，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万万碰不得，但就事论事解决一些应急之事也是可以办的。来滇后，阎红彦用整整半年时间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对政策纠偏、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省委作出决定：

一、对主要责任人州委、县委、公社书记进行组织处理；  
二、向全省灾民发放平均每人每天8两救济粮，对浮肿和妇科病人进行集中免费救治；  
三、要求把制止肿病死人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对让群众吃饱饭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强调：“不顾群众死活，胡吹，蛮干，不是马克思主义。”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组织的一大要件，是毛泽东企图消灭家庭私有制、建立斯巴达式军事共产主义的重要生活方式。1960年底，在阎红彦主导下的云南省委大胆决定：边疆地区一律不办公共食堂；而体现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的核算制度，也被云南省委进行了大幅调整：甚至允许远离生产队的单家独户或三家两户，作为生产队的“挂钩户”单独经营；生产队、个体户实行承包责任制……这些措施完全符合云南农村山区分散的实际情况，但阎红彦动作之大，当时确实有点吓人。他的许多指示具体的简直有点就是婆婆妈妈。比方：“边疆地区生活方式，现在吃的很简单，浪费也很严重，人吃、鸡吃、狗吃、猪也吃，吃东西就是那么一锅煮，包谷南瓜一起煮，一碗盐水，几个辣椒……”“不会吃，不洗脸，发也不理，筷子也不会用。我们政府的文件，总是提一大堆什么教育方针呀！社会主义啊、

爱国主义啊、阶级教育啊！……实际是很不负责任的，都是空话。”“工作队，要教他们生产，教他们生活，教他们由不理发到理发。”“文工队演的节目都是抗美援朝，太单调”。

在1960年代泛政治化的社会语境里，这些话确实让人温暖。而实践，及时给予了阎红彦丰厚回报。1961年秋，云南农村情况已有显著好转。80%地区生产、生活情况和政治情况都比较好。

## 2、告密

阎红彦的云南整顿顺水顺风，全国各地的整顿也顺水顺风。1962年，整个社会出现了1956年以来再一次宽松局面。毛泽东心情却并不舒畅，他原本想十五年“超英赶美”“一步登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异想天开的作派统统都惨遭滑铁卢。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发起挑战，说大跃进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威胁：“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斯大林死后遭遇赫鲁晓夫清算已如阴影来袭，毛泽东必须出手反击了。

1962年7月北戴河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离开会议原定议题，突然大谈阶级、形势、矛盾，谈“光明”、“黑暗”比例、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炮轰农村出现的“单干风”，大讲特讲阶级斗争，搞得代表一头雾水。9月，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理论。

按照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经典说法，社会主义仅仅是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一个“过渡阶段”，毛泽东颠覆此一提法，宣布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此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必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有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表述正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初奠基，亦后来被称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亦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八届十中全会决定在城乡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热。残酷的党内斗争再次拉开大幕。

这次会议上，一个告密事件让阎红彦意外爆冷。按照《工人日报》编辑何家栋说法：正是阎红彦的告密“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弹，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歌颂这位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作品体裁由纪实体改为长篇小说。1959年书稿完成，即将付印。为慎重计，作者将稿样送相关人士征求意见。阎红彦理当属于意见征求者之一。《刘志丹》既然是小说，当然可以虚构，阎红彦偏偏要“对号入座”。阎红彦和高岗这对老冤家一直要争的，无非就是陕北根据地到底谁是正宗创始人？高岗早在5年前就因“反党集团”身坠地狱，可阎红彦就是像农村怨妇，对这段历史恩怨不依不饶，认为小说还在抬高岗、贬老阎，简直就在翻案！一看样稿，气不打一处来，坚决反对出版。阎更不能忍受的是，待到他去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经开始发表小说部分章节。阎书记憋屈难耐，立即致电全国总工会和团中央要求停止刊载，还一状告到康生——这一卦，拍灵了！康生当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一律禁发，接着还提请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

阎红彦趁胜追击，在大会小会拿《刘志丹》做文章，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闹“翻案”。凑巧的是，这次会议前，彭德怀曾向中央和毛泽东呈送长信（所谓“八万言书”），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请求中央全面重审。会议期间，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和中央，重申冤屈，彭两次上书让毛大为恼怒，认为是向党发起新进攻，决心利用大会实施反击。阎此举正好为批判“翻案风”送来重磅炸弹。于是各组结合批彭，集中火力批判小说《刘志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很快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正讲话，康生乘机递过一张字条，毛主席一边念纸条，一边发挥：最后就有了毛泽东著名的“最高指示”：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

接下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为主任。整人的权柄一旦落入酷吏康生之手，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西北五省批省级干部被齐调北京“学习”，不少被诬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工人日报》党组、全总党组、中宣部亦未能幸免。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被撤，1965年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被关押；贾拓夫，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的“才子”，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被撤，文革被迫害致死；刘景范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李建彤后也遭关押，开除党籍。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被关押，陕甘宁老区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该集团的“黑爪牙”。一部小说株连万人，实为史上罕见“文字狱”。

八届十中全会吹响了阶级斗争号角。自1962年秋冬始，“阶级斗争”成了全国各级共产党组织执政的头号主题。次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杭州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从此开始。

阎红彦告密事件让他赢了个大满贯，其客观效果，确为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酿成一场株连上万人的大冤狱，同时亦让他本人广遭诟病。文革后，有人竭力为他辩诬，不但无济于事，反而越辩越黑。

### 3、昏招

综观阎红彦性格逻辑和处世风格，其实，对该告密事大可不必过度解读。作为陕北历史“山头”恩怨的继续，阎红彦像个固执的乡村怨妇携私复仇，趁一时之快，也就够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阎红彦政治上其实非常不清醒、不敏感，有时，干脆就是个糊涂虫。

八届十中全会9月27日落幕，云南省委立即认真传达贯彻之。参会代表、云南首长、省委第二书记于一川先行回昆的研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事宜。

有必要对于一川简做介绍：河北沧州人，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品学兼优，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共，自此走上革命道路。被人赞誉为“党的秀才，革命才子”。1950年代，宋任穷任云南省委书记，专门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把这位学识和经验均属丰富的“秀才”要来了云南。按于的思想水准和政坛历练，应该读懂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创新成果之宝贝的，只是久居边地，对中央极权下的服从意识遂有淡薄；加之仕途顺风，难免骄矜自负；最后，会议上他倒是记住了毛泽东讲了阶级斗争，此外

还讲了“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于是居然自作聪明地告诉秘书长梁浩，说：云南的情况与四川（指西南局）不同，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群众运动。还是要强调抓生产力，抓经营管理。

阎红彦因告密暴得大功，更是得意满满，回昆明立马一头栽进振兴云南的经济幻梦之中。对于省长自以为是的观点，他真心赞赏，鼎力支持。

于是，于省长受省委之托作《会议总结报告》脑子便短路了，说“我省两条道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单干风’并没有刮起来。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以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于省长的总结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议闭幕，阎红彦作总结发言，对于的会议总结充分认可，明确宣布：“一川同志作的总结，是经过省委讨论同意的。”接着代表省委提出“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

见鬼的事继续发生：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高调宣布，云南没有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主要的和首先的是通过重续贯彻执行政策，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把群众的生产运动组织起来，从中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启发诱导、分清是非，提高觉悟，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大旗升杆，高高飘扬。仅仅时隔两月，阎红彦就公然对着干，在全国发出了惟一一份公开宣布“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头文件，无异于掰了龙鳞，捋了虎须，吃了豹子胆。西南局一见此文件，当即提出，这是明日张胆地违背中央精神，责令云南检查。对此，阎红彦还发牢骚，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麻烦越惹越大。翌年5月，毛泽东对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批示，危言耸听宣布：

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同月召开的杭州会议，毛再次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会上公开点名批评阎红彦“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

这一回，倒是先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吓一大跳，他回四川马上召开西南局第二次全会传达杭州会议精神，专门传达了毛泽东对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评，责令阎红彦检讨，还要云南省委写出书面检查。李井泉斥责参会的于一川。于省长只得检讨。第一次不过关，二次，二次不行，三次——一直到会议结束仍未过关。西南局宣布于一川“回去再写检讨”。

阎红彦没有参加西南局的会议。他缺少政客的厚脸皮。杭州会议被最高领导点名，那一跳已吓得不轻。身材本胖，年年得到上海做吸脂手术（云南人称“割板油”）。这次回云南，高血压也发了，心脏病也发了，省委大佬们左安慰，右劝说，要他去上海看病，家里的事有人会料理的。阎如何客套不得而知，总之，他确实又去上海住院了。留在家里的事谁料

理呢？自然是于一川，有他全权代表省委去成都挨克。知识分子干部最喜欢表现自己对组织的忠诚。于一川属于知识分子干部，让他表现忠诚的机会来了。

#### 4、于、梁反党集团

于一川从西南局检讨回来，立马召开常委会检查错误。1963年5月28日，于一川将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加以综合，最后作《检查报告》称：省委“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认识上有模糊之处”，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

北京知道这回云南土佬儿吓得不轻，马上专派彭真前来安抚。常委会闭幕日，所有常委悉数到场，由于一川代表省委正式沉痛检讨：无非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对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抓生产多之类，还有宣传部的那个文件是错误的，与省委思想有关系……等等。彭真宽宏大量说，“常委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于一川于是再表沉痛，说问题严重，要继续向西南局、中央写检讨。中央大员于是更加宽厚，回答道“不必写检讨了”“我回去向毛主席报告”。

彭真离滇，云南省委马上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彭真视察云南的指示，会议再次印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照检查；接着继续代表省委再检查，又说省委宣传部那个文件有错误，“主要是省委负责”等等，最后形成正式《检查报告》呈报中央、毛泽东、西南局。云南省委官员们的态度实在太真诚，太沉重。西南局批复：“同意云南省委的检查。”

事情至此，关于“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引发的风波，算是暂告结束。于一川殚精竭虑，屁股基本擦干净，可以松一口气了。只是，1963年后的中国，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已如大网垂天，所有人都难逃劫数。云南省委企图按部就班工作已不可得，以至阎红彦不得不借于一川的政治头颅来祭一回旗。

1964年10月，根据中央精神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那个“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文件，作为重大政治事件旧话重提。这一回，文件的操刀手兼擦屁股者于一川、梁浩在劫难逃：双双成了“反右倾”的主要对象。云南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参会者对于一川进行揭发批判。于省长一个月作了4次检查，承认犯了许多错误，最后省委形成《关于于一川同志所犯错误初步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和西南局。《报告》特别强调于一川的“右倾观点是相当突出的”，挨了西南局的批评，他极力推卸责任（大家忘记了正是于一川去检讨的）。1965年1月，云南省委布置全省“四清”运动，再次召开专门会议继续批于，这一回，阎红彦恶狠狠称：于一川的检讨把许多重大问题都那么轻描淡写，好似至多不过是一些认识问题、工作问题。“一川同志是不是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全国谁也没有提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我们云南提了。”“所以，一川对十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是反映了他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是阶级本能的反映。”

于一川确实太能了，对人谦和，在干部中印象普遍良好。谢富治主滇时代，很多具体工作都由于一川担纲，谢调离云南，原本就推荐于一川接任，皆因李井泉从中作梗，得以让阎红彦作了封疆大吏。阎这个陕北“土老财”之霸陵刚愎与于一川这个京城书生的谦恭精干正好对比鲜明。把于一川干掉，可让阎书记六根清净。

一把手定调，批判继续升级。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揭发，说“于（一川）、梁（浩）集团”实际已成为地下省委，已经在反党。”“八届十中全会后，于一川害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主张农村工作主要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梁浩背着省委极力加以宣扬和执行。性质已上升至“反党集团”层次。

干部们的揭发批判已然狂涛巨澜，事情就顺水下滩了，许多庸俗的花边传闻也派上了用场。于一川夫人王静，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本系于一川大学同窗，王有一表哥某亦二人同学，时在交通部交通管理局任局长。三人在校关系皆不错，而王与某局长又有青梅竹马之谊。王静每次赴京开会理要前去探望表哥，此事登上云南省委“简报”遂成了：王静与表哥关系暧昧不清，于一川甚至甘心情戴“绿帽子”，瞅机会送夫人去北京幽会，云云。党内斗争有时就这么庸俗。更要命的是：时任组织部长、同样精明干练的孙雨亭意欲上位，正急于搬开王静这块拦路石，遂有了此类告密之举。四清简报称，于一川对阎红彦来滇主政心有不满，曾私下发牢骚，说“什么红军？不过西北红军！”云云。

接下来就是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1965年2月20日，云南省委向中央及西南局报告，认为于一川犯“政治上右倾”等错误，定性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央及西南局则据此作出正式处理：撤销于一川的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军区政委及党委第一书记等所有职务，调河南省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反党集团”另一名主犯梁浩则被定为“一个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留党查看两年、工资由9级降为12级的处分。被这次机关“四清”牵连的干部不少都在一年后的文革中再次蠢蠢欲动，再后来，甚至两派斗争中呼风唤雨，演出许多荒唐剧。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再说。

对于于一川、梁浩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事们，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造反年代，他们对理想的献身激情和信念追求是完全真诚的，我们又必须承认，当造反起家的共产党已掌握了全国政权，尤其在毛泽东这样一代雄主之下当了大小诸侯，历史又毫无例外地要他们在陌生的政治生态中重新学习：如何使用权力？如何学习新的生存技巧？造反和执政之间的品格要求相差如此悬殊：造反需要的是拼命和牺牲、执政需要的则是操作、柔韧、退让、妥协，平衡术和生存技巧（特别是自我保护技巧），甚至或真心、或违心的服从与逢迎，而不是信念和是非感，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不排除出卖同伴。于一川们还没有学会这个，所以过于积极的奉献，偏偏收获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制造“于梁反党集团”冤案，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个从革命者转变成混迹官场多年的技术官僚，对于假革命之名而制造的荒唐和残酷，他应该看得太多，也应该有起码的善恶感，但为了向最高当局输诚以求自保，他也学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犹豫地把明明和自己思想一致、行为与共的同事拉出来祭旗，政治上的糊涂虫和经济上的实干家，满以为如此一来便可一劳永逸。事实证明，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 5、狂飙

云南清算“于梁反党集团”不到一年，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便从天而降。按照阎红彦的惯性思维，文革，无非是多次运动的再版而已，云南只需要按北京的套路照葫芦画瓢就可以确保无虞。北京批海瑞，云南也跟着批海瑞；北京批三家村，云南也弄个“三家村云南分店”批一批；北京揪个大家伙，云南也揪个大家伙（宣传部长高治国）；北京向学校派工作组，云南也派工作组。至于宣传舆论，同样老套路，找些英雄模范跟着省委调子起哄就行了。实在没有什么自己的“新、奇、特”可说。

如果需要介绍，则有跟着起哄的云南英模有两位在后来的文革故事中暴得大名。

一位叫七林旺丹，著名的“雪山雄鹰”、藏族民兵英雄。七林旺丹在1959年的藏区平叛中英雄独胆，闻名遐迩，文革中被圈定为“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因其名笔划最少，



在“按姓氏笔划排序”公布的中委名单中，他总是名列榜首——接着进入云南省常委班子，接着副书记，再后来“四人帮”垮台，被清理出局，黯然离世。还有一位明星劳模徐学惠，1959年为保护公家钱柜被匪徒砍去双手，一时声震全国，他在批判中写道：“我是党的女儿，绝不容许你们来攻击我最最敬爱的母亲——中国共产党。我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决心在这场关乎母亲的安危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和广大工农兵一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把你们这伙披着羊皮的狼的进攻彻底打退。”文革伊始，为表反帝反修之决心，徐学惠断然将当初苏联“修正主义”给她安装的假肢统统扔了。接下来，没有双手的女英雄继续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誓言。她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造反，后来还被推荐为省革委副主任。文革破产后，她被“最最敬爱的母亲”隔离审查达一年零八个月，皆因没有双手，得以幸免囹圄之灾。

运动进展到此，云南省委主持文革大权在握，矛头所向，果然所向披靡。直到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亲自批播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运动进入学校，事情发生了变化了。

文革前17年，在与世隔绝、封闭环境中长成的一代大学生，经过不间断灌输，精神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满脑子的概念就是：一、当“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二、牢记阶级仇恨，“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三、“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拯救正在堕落的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还有一点必须说明：1957年反右刻下的精神恐惧，加上学校严密的官办社团组织（共青团、学生会等）有效控制——学生这个社会上最敏感、最激进、最不稳定的成分本来完全可以让云南省委大人物们放心无虞。

问题在于，随着文革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疯狂升温，所谓做“做党的驯服工具”已经变为了“作毛泽东个人的虔诚信徒”和冲锋队员，而不再是简单的、各级基层党组织的“驯服工具”。这样，人们很快发现，只要毛宣布哪一个层级（无论多高层级）党组织出现叛逆，立即就会成为学生们攻击的对象——事情有点像马丁·路德提倡的宗教改革，每一个教徒都毋需接受基层教会层层束缚，只要凭借虔诚便可直接领受上帝旨喻（所谓“因信称义”）——对基层共产党组织，风险大大增加了。只要毛泽东一句话，所有的当权者便可顷刻瓦解。

1966年夏天，各级官僚还沉醉于1957年反右“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美梦之中，毛泽东的文革新招注定被他们误读——这一次，毛泽东想引出洞的，正是惯于整人的共产党官僚自己。

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各地纷纷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灭火。云南也不例外，而且，云南高校工作组很快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打法。这些打法是：

一、对运动打击对象和整肃范围划定框框，设置底线。云大工作组负责人、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要严肃、负责地回答一个问题，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正确的，不能怀疑。”警告：“省委是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是不容怀疑的。”“要提高警惕，如果有少数人想鼓动闹事，要顶住。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领导。不要和工作组闹对立。”

二、制造高压气氛和恐惧感。通行做法就是用反右派故事对师生进行恫吓。为“杀鸡儆猴”，工作组直接动用专政机器抓人。云大工作组进校5天后，6月9日，即让省公安厅来校高调抓走两学生。被抓之一乃化学系学生鲁坚，另一位为中文系黄某。作为对照，工作组同日偏向师生积极分子赠发《毛主席语录》2000余册。其时“小红书”之宝贵堪比基督徒之“圣经”。大棒与胡萝卜齐挥，足够让师生喜惧杂陈。

抓捕鲁同学罪名是：他一老乡在昆明工作，该老乡据说是个“反革命分子”，而鲁偏偏与其多有过从；黄同学被捕的理由更荒唐——黄性格开朗，一贯爱说笑，尤善吹笛拉琴。9日上午，黄正在宿舍吹笛，团支书王某手翻报纸低头回屋，黄想开个玩笑，遂大喊一声“缴枪不杀”，然后以横笛作“枪”前刺：没承想笛子报纸戳了一个窟窿。那年月报纸天天都印毛泽东宝像，也活该黄生倒霉，这一“枪”正好洞穿了领袖“光辉形象”，性质很严重了。王书记和同室杨某当即表明严正立场，黄吓得连连检讨——此事用最快速度报至工作组，下午4时，公安厅警车便呼啸而来，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将黄某正式逮捕。抓离校园，中文系党总支紧急召集的大会抓紧批判。知情人情绪激动揭发黄同学仇恨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称用笛子行刺时对伟大领袖如何之“咬牙切齿”，接着还有临时安排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其余同学争先恐后纷纷发言以向毛泽东表忠心者不提。

打法之三，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制造混乱，搞得人人自危。阎红彦提出口号：“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阎以“组织革命化”之名，提出要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称：“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论是谁都可以揭”“有什么揭什么”。阎称“全国要抓40万右派。57年云南搞了12000多，“云南这次恐怕不止此数。”

与高校运动高歌猛进同步，各专州县均派出工作组进驻县第一中学，其余中、小学教师则集中整训，大搞“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不少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以备清洗开除。许多县被整教师达总数的20%以上，不少教师被逼自杀或逃跑。边疆文化本落后，小学教师在各山野旧县算得上稀有的知识分子了。云南文革之初，当权者们对广大小教和文化人的迫害，实际上正是在为自己催生掘墓人。后来，云南的县、区、乡、村，最先起来造反并成为当地群众领袖的，很多都是这帮小有文化的边地文化人。

打法之四，重点圈定名人、名教授，组织“群殴”，造轰动效应。除已落马的云大原校长高治国，工作组又抛出一枚软柿子：副校长李广田。李乃著名文学家、诗人，批起来最博眼球，李先生著作等身，随便挑几篇文章摘几句话来批倒批臭，实在绰有裕余。校党委将其在解放前至文革初发表的“有问题的文章”汇编成册发到全校各班组供批判用。其中散文《花潮》最是有名，专赞昆明圆通山公园樱花美景，写得文辞绮丽，满纸墨香。圆通山樱花潮乃昆明一大春事，文革后，受益于李文影响的圆通公园干脆将该文勒石刻碑，以助游兴，大增经济效益。文革批判，皆取文中所引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还有“天气冷了，想要一顶帽子”的文字，打手们遂将此联系大跃进破产后的经济困境，上纲上线称该文“春泥”暗表“反党决心”不改；“帽子”则是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冷”则是影射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的社会气候。大字报道：“李广田不是想要一顶帽子么，给他一顶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正合适”。

7月19日的《云南日报》宣布，揪出李广田是“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胜利”。李广田很快被送“劳改队”劳动，遭受批斗两年余，终于挺不住，1968年11月2日，对人悄悄说一句“士可杀，不可辱”，然后悄悄到云南大学附近的莲花池，自蹈清波，死了。

机关本是阎红彦后院，五月以来，批高治国、批李孟北，省级机构、尤其宣传部被打为“烂了的单位”，组织庞大工作组进驻，搞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试验田”，

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省级机关参加文革运动的8900人中，被大字报点名的干部4400多人，占45%。这些，同样成了阎红彦的掘墓人。

或问：文革开始后这一系列劣迹……阎红彦的形象为何与履新滇地时殊若云泥？

一个体恤民意，连吃饭、盖被子、用筷子都关注入微的清官暖吏，为何一到文革顷刻变脸，成了蛮不讲理、文过饰非，草菅人命的酷官恶吏？答案只能是：革命者与技术官僚品格之巨大差异也。革命者造反，只关心对真理的价值追求，为此可舍弃一切，包括生命；而一旦掌权，需要的只是官场技巧，关心的只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选择，为此可舍弃真理。如果说阎红彦初到云南，尚存几分革命时期的善恶之念，那么经过1960年代的折腾，已修炼得日臻老道，在风高浪急的文革大海，这个云南“船长”为一己之安全，自然毫不犹豫将可能造成威胁的水手扔去大海喂鱼。

毛泽东本来就要天下大乱，整饬当权派，事情被全国的阎红彦们这般一弄，事情就全搅黄了，难怪一回北京他就生气，说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

阎红彦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搞“二次反右”，忙活两个月，在各大学、文化系统、中小学，甚至省委机关制造出一大批仇恨者，弄出了一个让毛泽东“感到很难过”的“冷冷清清”的烂摊子。这恰恰是毛泽东最想要的。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开始动手开刀了。

1966年7月下旬，阎红彦奉命上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得知毛泽东拿工作组说事，实际是要对“五十多天”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开刀，果然慌了神，接连不断致电省委研究对策。阎红彦的铁杆智囊、省委组织部长孙雨亭立即给各工作组打预防针抚慰，道：“撤了不要怕，右派领导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来打倒右派，左派就坚强了”“工作组在，右派暴露不够，左派锻炼不够”“要引蛇出洞，混战一场有好处”。接着，阎红彦的北京急电来了，说“昨天清华大学开两万人大会，总理说，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接着，得知全国各地已在陆续撤销工作组，知道云南不撤断难过关，8月6日，孙雨亭到云大宣布：“云南工作组没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当时派也对，现在撤也对”。（干也正确，不干了，也正确，这种惯用逻辑大家都很熟悉了，永远伟大光荣正确）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正式昭告天下，云南省委无路可退。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百万“文革大军”，接下来，大串联，各地炮轰、火烧已起，云南省委几个月政治高压溶炼出的仇恨已如岩浆待喷。坐在火山口上的云南省委，传统武库里能够翻找出来对付老百姓的手段越见稀少。洪水已至，管涌在堤坝到处出现，只等某一潜流突破，整个堤坝就要溃塌。

## 6、八二三

云南文革史上涌来的第一波洪流，来自一封普通的北京来信。

8月22日，昆明农林学院学生周鸿收到清华大学王姓同学一封信。信写得很平实，无非介绍北京高校的情况，说他们去天津串联的情况，表示想回家乡支援文革，全文1887

字，一个煽情的词儿没有，亦无流行的大喊大叫。就这么一封信，把老实巴交的云南大学生的文革激情一下子点燃了。后来，这封信被人称为云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几十年后，周鸿女士已是云南著名生物学家，远离政治，尤其那封《北京来信》，周女士总是三缄其口，一笑而已。当初她却是很在意的，不仅在意，简直搅得她热血沸腾，一夜未眠。一年后的1967年8月23日，她就此信在《云南日报》专门撰文纪念，题目是“革命更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文章称：“这封信，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把首都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天津小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革命口号，带到了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及其死党长期禁锢封锁的昆明。”周鸿说，她“和同学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封信，深深为首都小将的造反精神所鼓舞，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照当时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系列迹象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云南省委就是大有问题。革命的烈火在我们胸中燃烧，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起来造反了！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首都革命小将作我们的榜样，我们斗志昂扬，无所畏惧！这天夜里，我们怀着一颗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高呼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冲出校门，打破阎王殿的清规戒律，到全市的高等院校进行革命串连。我们和春城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炮轰省委，火烧市委’。从此，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春城越烧越旺，阎王殿在席卷春城的革命风暴中开始动摇。”

所谓熊熊燃烧，是指八月二十三日一早，周鸿和昆明农林学院的同学分别到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等市内的大专院校贴大字报，终于冲开了各校园的沉闷空气，引爆了大学生们压抑已久的情绪，于是，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的激进学生纷纷制作“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标语牌，上街游行，游行过程中，理所当然遭遇了官方组织的工人的冲击和打砸，声称“你们这些学生，共产党把你们喂饱了，敢造反了，省委是能够用炮轰的吗，市委是能够用火烧的吗？你们这伙学生完全是反革命”。结果是大学生情绪愈加对立、愈加愤慨，参与人数愈益增加，重做的标语牌越来越大，除“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又增加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五花八门的口号。最后，愤怒的学生干脆直扑省委机关，要求省委大佬接见。昆明街头，大字报，大标语一片铺天盖地。

事发当天，云南省委正好召开开三级干部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偏偏开幕之日，几千大学生便呼啸闯来搅局。突发事件给对毛泽东文革意图摸头不着脑的官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课……

关于“八·二三”事件集体记忆的表述还有很多。被“革命年代”刺激得头脑热昏的年轻人，后来干脆模仿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排了一出《春城风暴》对823故事大加赞美。从此，“823”这个数字注定成为云南人永远无法抹去的梦魇。

## 7、反扑

云南和全中国一样，共产党建政后一拨接一拨运动的政治高压让边地社会鸦雀无声，而暗中壅塞、需要化解的矛盾、需要宣泄的情绪、需要疏导的恩怨却越来越多。17年，当局通过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妇联，包括少先队，将世俗生活全部掌控在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式的集体框架之中，不同行业、不同层级之间，基本上不能进行正常交流，社会矛盾的解决找不到任何出口。

从8 2 3这一天开始，情况变化了。群众有了毛泽东交给的舞台、一套阶级斗争的武器，于是一夜之间，情绪被点燃，矛盾被激化，人人成了批判家，全都跳到台上争吵谩骂、刀光剑影，你死我活。

首先是高校学生开始频集的骚动串联。8 2 3事件后，五花八门的战斗团队便像雨后蘑菇，满世界疯长。官方统计：“从‘八二三风暴’后至9月中旬，昆明工学院出现了‘延安红卫队’‘井冈山红卫队’”、‘炮轰战斗队’、‘八二三无产阶级造反队’、‘向阳赤卫队’等1 3个组织，后来迅速发展到上千人。”官方党史又载：“9月4日，云南大学成立了‘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和‘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几天后，又相继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战斗队’、‘毛泽东主义敢死队’等组织。9月14日，上述组织联合成立了‘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造反派组织之一。”。这些组织成立时间、人数、活动情况，官方记载如此详细，佐证了当时官方派人暗中搜集、被造反派称为“黑材料”的事实。

群众对省委不再唯命是从，只好用“组织手段”让基层领导直接弹压。八月二十四日晚，省委实力派大佬孙雨亭打电话给昆工党委书记兼院长赵凤歧，责问：“是怎么管你的学生的？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学生放到社会上来？”

赵答：“工作组进校，我就靠边站了，我管不了嘛”

孙命令：“从明天开始，你把你的大校门锁起来，不许学生上街”。

赵反诘：“锁校门不妥吧？”

孙道：“你还要不要你的党籍？你如果不要你的党籍了，你就不要锁了；你如果要党籍，从明早开始就把校门锁起来”。

省委领导下了死命令，基层领导焉敢不办？8月25日，昆工大校门果然锁起来了。同学们前去找院长论理，赵自曝苦衷并暗中提示：“我锁了大校门，并没有锁学校的后门和侧门，你们照样可以出去嘛。如果到了无奈时，我再锁了后门和侧门，学校四周的围墙都是土基砌的，你们推倒照样可以出去嘛！”。大校门果然只锁了一天就无法为继，倒给无计可施的省委领导留下笑柄。1978年“揭批查”，赵凤歧被认定为“卖身投靠”的老干部。

（未完待续）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

【往事非烟】

“一打三反”亲历记

• 王裕群 •

（本文作者一九五八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一九六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校时经历文化大革命以及在1970年随学校搬迁至安徽省的全过程。——编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尊重历史，纪念逝者，帮助年轻一辈了解当年科大下迁带给教职员工的苦难，编者着手收集、发表几位科大校友亲历科大下迁的回忆文字。这些文字流传于科大校友群，构成科大乃至国家可信历史的一部分。作者大多年过古稀，向他们致敬！

“文化革命”长达十年，其间穿插着许多阶段，是一个又一个的小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是其中甚为惨烈的一次运动。这次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对“文革”运动持有异见的人士。

1970年早春，科大正处在搬迁合肥的忙乱中。由于合肥的校区容纳不下全校人员，各系学生及部分教工被分散到淮南煤矿、白湖农场、铜陵、马鞍山、寿县农场等地驻扎。我家八口人（公婆、侄子侄女、我们夫妇及两个儿子）挤住在校园西侧的西平房。我丈夫当时属于一分部成员，很快被发配到寿县农场。因两个孩儿幼小，我留在校区老弱病残组成的“留守组”参加运动和劳动。搬运从北京运来的仪器设备和清理校园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劳动任务非常繁重。

#### ◇ 第一波冲击

李东林是安徽省著名的造反派头头，他被分配到我校任“工宣队”队长。他似乎对科大怀有天生的敌视。在全校的大会上，他的口头禅是：“告诉你们，这里是安徽，不是北京！”，“谁不办就办谁！谁不斗就斗谁，谁不批就批谁！”，“要坚决反对温情主义！”

大约是在二月的一天，我系干事曹洪大同志在主楼三层的大房间里一个人独自整理凌乱摆放的双层床。猛地拉一张床，他没有看到上层放着的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经震动掉落地上被摔得粉碎。他知道这下闯下大祸，心慌意乱之下，用旧报纸包起碎片扔进楼道的垃圾道。

第二天，收垃圾的工人发现了这些碎片，他也怕承担罪名，遂将此事报告有关方面。“领导”追查到我系，老曹的问题躲不过去了！我系留守组召开大会，宣布我们系出现反革命事件，要求大家擦亮眼睛，克服“温情主义”，认清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斗争！可是，大家对此意外事故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还是难以接受，批判曹的力度达不到要求。

军宣队当时的领导是姜政委、石政委、曲政委。好像曲政委是分管我系的，他给我的印象为人比较温和。他亲自来做思想动员工作，他讲了一个发生在合肥的事情：有一位农民拉着排子车，请了一尊毛主席塑像，放在车上怕摔坏了，就将塑像用绳子捆好挂在脖子上吊在胸前，以此表达对毛的崇敬。可是却因此被民兵抓住，说他“把毛主席捆起来了，是反革命！”此农民被判“反革命罪”。曲书记以此例说明：“动机与行动的一致性”，教育我们：即使曹洪大没有反毛的动机，但行动已经构成“反革命行为”。最后，曹洪大几经严厉批判后，被开除公职，全家被返送回老家。

我至今不知道后来如何为曹洪大平反。令人欣慰的是，我得知，多年以后，曹洪大进入中央党校工作，曾与当时随迁合肥的陈瑞生教授会见过。

#### ◇ “一打三反”的开端

大致70年三月份，一场新的运动“一打三反”来临。

“一打三反”的“一打”是“打击反革命分子”，“三反”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但在工军宣队把持下，要通过这一运动把科大人压服。

运动的开始是宣传“北大经验”，是对付有“反动思想”的人员，要求交代对“文革”不满的思想，内容有十几条之多。记得有“对问题要上纲上线”，还有一条是交代问题“要竹筒倒豆子”，即要彻底痛快地把自已的问题“倒”出来，不要挤牙膏似的被动交代。负责

我系留守组的工宣队员在动员大会上宣称：“你们当中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掌握情况！”“有的人长期偷听敌台，有的人看反动小说‘西行漫记’，有的人拉琴竟然拉美国国歌！这都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老实交代！”看来，这场运动不再是针对“走资派”、“阶级敌人”，而是针对全体知识分子，所有的教工学生均成为整肃对象。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人人写交代材料。每天开批判会，反对温情主义，实行“谁不斗就斗谁，谁不批就批谁”，形成了人人自危的一片恐怖气氛。

看来，工军宣队有一个摸底的过程，一批“革命骨干”是他们依靠的对象，并鼓励群众斗群众，互相揭发，慢慢形成了他们重点整肃的对象。

为了发动这个运动，首先被拿出来示众的是三系六五级的一个以王学为首的、由四五个女生组成的“反革命小集团”。她们首先被带到合肥总部，召开全体大会，听她们“现身说法”。这几位同学站在台上，先交代她们的“罪行”。我听出来，原来王学的母亲是我中学母校“北京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令我震惊。早在北京期间就听说过，母校一群初中的造反派（全是一帮十几岁的女孩子）在六六年八月五日批斗校领导时，竟然将卞校长活活打死，成了北京中学生残暴打死校长老师的开端！我一下子就对王学产生极大的同情。一个母亲因文革而丧生的孩子怎么不会对这场惨烈的运动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

不知道她的“问题”是怎样暴露的，是否被什么人告密，不得而知。王学的日记及与男朋友的通信全部被搜查出来，她一下子落入深渊，任人宰割。她的思想无处可藏，只有认罪，也只有痛骂自己，狠批狠斗，上纲上线，才能得以存活下去！而那几个同情她的好朋友也逃不出被批判的厄运，与她一起声泪俱下地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她们成了“现行反革命”！

她们的现身说法警示着所有的听众，无异于告诉我们：谁要是有类似的“反动思想”，就必须老实交代，如果抗拒，就比这样的下场更惨！

据说她们将到其他系所在地轮番现身说法，而后各系都将照搬这一模式，对有问题的教工和学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与此同时，跨系地组成了一支“天兵天将”队伍，他们是一批极左的积极分子，斗争中铁面无私。记得其中教工有余××为代表，学生中有陈××。他们是一支特种部队，哪里运动开展不力，他们就打到哪里煽风点火。

当时，校一级的两派头头被隔离起来异地办学习班，不准他们与群众接触。只有在全校开大会时，他们才集体入场。这时，我不时看到熟悉的面孔，从前挂满笑容自信的脸，现在变成消沉落寞的模样，知道就是他处于了被批斗的境地。

我们不时听到一些校学习班的风声。在北京阶段，“延安派”的头头曾经设法与上面联系，我系的陈×从前认识戚本禹的老婆，曾打算通过她找戚本禹反映情况，这件事李恒昌参与过，也不知什么人又揭发出他曾经说过“林彪头上有反骨”，成了攻击林副统帅的罪行，导致他“畏罪自杀”上吊而亡。李恒昌是我们系干事，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同志，他早年参加解放军，是从部队调来科大的。他一直积极工作，吃苦耐劳，群众关系极好。在搬迁中，他战斗在第一线，是北京站的总指挥之一，起早贪黑地安排运输人员和器材。到合肥后，他又担任“文攻武卫大队”队长，相当于过去的人保部，每天黑夜执行巡逻，保护校园的安全。在我心中，他是一个难得的好同志。他的突然自杀，对我们又是一次震撼！他是搬迁到合肥后，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职工。

腥风血雨向我们扑来！

六系的64、65级同学被安排在淮南煤矿。不久，为展开“一打三反”运动，一些同事陆续被调到淮南参加“教工学习班”。看来事先队伍已经泾渭分明，有的人是革命动力，有的人是革命对象。

我们一部分人仍然在合肥留守。从北京陆续运送过来的各系仪器设备、后勤物资不断地到达火车站。只要车皮一到，我们就立即出发去车站接车，有时半夜大喇叭响彻校园，调动我们去卸货。然后再搬着沉重的示波器、稳压器等等抬上三四层楼。当年合肥的建筑非常简陋，楼梯被我们踩得颤颤巍巍，墙壁是苇箔和泥巴糊的，稍不小心就撞出个大窟窿，时时真担心楼板无法承载如此沉重的设备而塌陷。我们就这样边劳动边开展“运动”。

记得一件小事。当时除了白天劳动、开会，晚上也要安排活动。俞××是四系项志麟先生的夫人，由于项先生视力严重退化，俞××必得先搀扶他去四系会场再来我系会场，经常因此而迟到，受到批评。有天晚上是学唱样板戏，她又迟到了。而大家都在学唱，她却不开口唱。不知道被哪位积极分子发现了，她被当场责问“为何不唱？”她答：“我从来不爱唱歌，更不喜欢唱京剧。”这下，被上纲上线，曰：“唱不唱样板戏是阶级感情问题，是对江青同志的态度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不是爱好不爱好的问题！”可是俞××梗直脖子，一声不发，任凭别人批判上纲，不卑不亢。

当年就是如此，不知什么事情被抓住辫子，就迎来一场批判。

不久，传来了淮南学习班的消息，使我们十分震惊的是铁林挨斗的情况。当时只听到只言片语，根据后来了解的情况，回忆如下：

铁林是一位女实验员，她的先生是外单位的，所以她单身带着五岁的女儿来到合肥。责令她去淮南学习班也只能将女儿一起带去。

有一天，这个小女孩与另一个比她大两三岁的孩子一起翻看“人民画报”，其上有一幅毛主席的大照片，这女孩指着照片说：“他像胡传魁”。可怜的孩子，大概样板戏里胡传魁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可能是那个大孩子“会告状”吧，这句话就被汇报到上面去了！这下成为严重的问题，涉及到她的妈妈，有人认为“小孩这么说，一定是她妈妈教的！”于是，铁林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非要逼迫她承认“对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她不认罪，就被辱骂并有人动手打她；她还不承认，就揪着她的头发游街，拖着她到食堂前，让煤矿工人围观，当众开批斗会，直到她瘫倒在地。

此后，有人威逼她的女儿，诱导孩子承认说：“是妈妈教的。”并告诉她：“只要你这样说，你的妈妈就能回到你的身边。”那么小的孩子怎么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呢！因此铁林遭到更为严厉的批斗，给她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铁林的表现始终坚强。可是，后来孩子又“翻供”了，实话说“不是妈妈教的”。

有的同事如尤姗琪、纪风等同情铁林，斗争不积极，“革命派”们就怀疑是她们“教孩子翻案”，遂将她们两人作为铁林同伙进行批斗。连续地批判斗争，巨大的精神压力给这几位女同志带来身心严重的摧残。



多年以后，我遇到了纪风的丈夫么子瀚老师。他告诉我，在淮南学习班期间，纪风曾托付过高京生，他带回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不能回到合肥，请告诉老么我没有罪！”么老师还告诉我，一打三反运动之后，纪风情绪低落，精神紧张，他曾与吴有夫一起带纪风去安医看病，诊断她患了精神疾患“强迫症”。纪风2008年因患免疫力低下的硬皮病而去世。

我尚不知道铁林、尤姗琪她们现在可还安好，也不知道那个当年五岁的小女孩受到如此惊吓后，给她的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铁林，仅是在学习班被蹂躏的一个例子。还听到我系656年级有一位学生在被隔离审查期间设法逃出而卧轨自杀的消息。

#### ◇ 我的炼狱

在留守组，我被责令“交代反动思想”。我大概早就上了黑名单，是事出有因。

早在1968年秋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系60级学生许嘉陵被“专政”，在一天的全校大会上他被示众当场逮捕。此后，他的交代材料中涉及到我。许嘉陵是老干部许涤新的儿子（许涤新同志早年在上海，后来在重庆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我曾是他的授课老师并任政治辅导员。所以，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许嘉陵曾约我在小松林谈过一次话，主要是告知我老师们和文革小组在怀仁堂吵架的具体情况，并谈及江青及陈伯达当年在上海的一些历史问题。我思想上当然是站在老师们一边，对文革小组极为反感。但是作为老师，我还是严肃地告诫他：“这些问题涉及大是大非，心里知道，不可到处乱说！”没有想到，他的言论还是被揭发出来，而被专政后他又牵连到许多人，把我也“交待”出来。

教研室的积极分子们得到消息如获至宝，随即对我展开攻势。我面临一个艰苦的抉择。在经历了严重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决定承认与许嘉陵有过这次谈话。我从一个原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这是我的历次政治鉴定的开头一句话）的共产党员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对象”，迎来激烈的批判斗争。之后，接着在其后的“整党”阶段，我进行“自我批判”，深挖思想根源。当时的军宣队某副政委与我个别谈话，他说，在干部子弟中流传一些小道消息，对文革有抵触，可以理解，善意地劝告我放下包袱继续前进。此事在北京遂告一段落。

但是，到了合肥，又逢“一打三反”，我的问题旧事重提，也在意料之中。尤其在王学集团现身说法之后，我预感在劫难逃。我曾很想找曲政委谈一下我的想法，但是几经犹豫，没有机会走上前。

我成为留守组的重点对象，开了两次大会要我“老实交待”，都不能过关，第三次，我挖空心思，决心更彻底交待，争取过关，精心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文章。在批判大会上，刚念出第一句：“我最大的罪过是错把江青同志误认为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主持会议的胡建凯老师“啪”地一拍桌子，吼道：“王裕群继续放毒，把她拉下去！”我很委屈，好不容易决心“竹筒倒豆子”又不让说下去，怎么才能过关呢？

在校园里，我没有垂头丧气的挨整模样，可是凡知道我被审查的同事没有人敢与我接触，很熟悉的同事见到了也像是陌路人避之不及。只有回到家中，见到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的心便充满柔情，忘却世间的冷酷凌厉。

在一次在去车站搬运物资的路上，胡建凯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桡桡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我心领神会，他是在暗暗同情我，鼓励我。我理解，一些被推上前台的同志也是出于无奈来担当这样的角色。多年以来，我们始终是知心的好朋友。近年，老同事好朋友聚会，提起往事，李清华也对我说：“当时那样做，是为了保护你呀！”

七月流火的日子，我被通知“到淮南学习班接受审查”。当时，我的丈夫在寿县农场劳动改造，家中有瘫痪在床的87岁的老公公和70岁身患严重高血压的婆婆，还有年仅两岁两个月和七个月尚未断奶的两个幼儿（随迁来的侄儿侄女已经离开合肥），我离开这个家，他们如何生存？可是，没有办法顾及这些。

当我被押送到淮南学习班，迎面看到“欢迎”我的大标语：“王裕群必须老实交代”、“王裕群不投降就让她灭亡！”我还看到昔日老五系德高望重的同学兼同事顾俊廉，他坐在门槛上目光呆痴而茫然，一脸落寞的神情，显然他也成为批判的对象，令我十分诧异。

这个学习班是借用煤矿的一个幼儿园不大的院子，紧紧挨着铁道边。院子里有一个公用的露天水龙头。房间分别做宿舍，各班会议室和办公室。我被分配在一间十多人挤住的宿舍双层床的上铺。我的顶头是一位65级的“反动学生”，不知为什么她被放在教工学习班里。

这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姓丁的部队连级干部，人称丁队长。我在学习班期间，没有见过校系领导人光临过，这里成为丁队长一手遮天、指挥役使的阵地，导演着一个施虐、戏弄、逼供的独立王国。全班一共有六七十名六系教职工，被分为四五个小班，每班大约十多人。每班有一两位班长，是工军宣队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我们熟悉的同事，只有两三位男士，以女将为主，可能她们斗争性更强吧！被批判的对象分散在各组，每组两三名，其他是“争革命群众”。

初来者先要接受“欢迎仪式”，就是“打态度”。我被分配在65级学生朱某某为班长的班里。当天晚上，我坐在（这对我是客气的了）大家的对面，班里十多人都是平时的熟人。他们念毛主席语录，举着拳头喊着口号威胁我；我却没感到害怕，反而觉得有些滑稽。此后几天，大家帮助我“学习北大经验”，还是要“上纲上线”、“竹筒倒豆子”等等；同时对我宣布“学习班纪律”：“不许与人交谈，包括上餐厅、上厕所”等等。接着，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被专政阶段。

第一个浪潮是批判我的“阶级斗争需要论”。因为，我对文革运动很困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冤枉，联想到所知在革命过程中、延安整风中、历次运动中也多有被冤枉、被误杀的自己忠诚的同志，所以自我解释为“这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罢！”同事们贴出大字报、开会批判这种论调。我心中却暗喜，自己竟然形成了一个“理论”！

此后的日日夜夜是难熬的写交待阶段。那年，七八月的安徽盛夏，持续四十度高温的炎热烤灼着我们。有时我们在烈日下劳动，用铁刷刷铁坑柱的铁锈；更多时间，我坐在幼儿园孩子用的小板凳上，窝在小桌子上写交待材料，时间长了，腰酸背痛。蚊蝇也欺负我们这些生客，蚊子特别厉害，浑身被咬过之后留下长期不消失的红包，又痒又痛，最后化脓流汤。难以入睡的夜晚，每每尖利的气笛声划破夜空，运煤火车从窗边疾驰，轰鸣呼啸而过，是又一种恐怖威慑，受到惊吓的65级女生曾从上层床跌落地上。

我们与下煤矿的工友们同食堂用餐，幸亏当年对工人同志们尚且关照，虽然炎热难当，中午还是学工人们喝滚烫的猪肝菠菜汤，让浑身出透汗以解除疲劳。这是生存的需要。我在小院中写材料，不时会听到从各个房间里传出的叫骂声、拍桌子打板凳的声音，那是组长及积极分子们呵斥被整同事的战斗；有时却听到从办公室传出丁队长与组长们吃西瓜、嬉闹的笑声。这真是悲喜两重天啊！我纳闷的是，有的组长自己的父母或亲人也在受磨难，但她仍能坦然地充当“革命闯将”，她的内心是什么滋味？

我的第一批交待材料被朱组长狠狠地劈头盖脸地扔回来，说“不合格”，必须写清楚“何时、何地、何事，如何想的！要具体，不得含糊其词！别想蒙混过关！”

随时召开的批判会在敲打着我。我孤立无援，感觉自己像一叶孤舟漂浮在惊涛骇浪中，不知何时迎来灭顶之灾，不得不挖空心思地逐一细细回顾文革以来经历的每一件事。这给了我一个沉思默想的梳理过程。恰恰是这个过程，使许多过去模糊的感觉上升为理性的判断，反而使“反动思想”更加清晰而确定。党的教育，不仅让我们“做驯服工具”，同时也教给我们“为真理而奋斗”、“五不怕”、“实事求是”、“明辨大是大非”、“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明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要坦荡、正直、无私；我最憎恨虚伪、撒谎、阿谀奉承。这些扎根在脑中的理念给我明辨的眼睛，清醒的头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认知并没有错！要把心中的想法痛快地写出来！

从江青装模作样“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到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毛的“无法无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红卫兵的疯狂打砸抢；从老师们大闹怀仁堂（所谓“二月逆流”）到自己的父亲被打倒被抄家；从“文攻武卫”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夺权运动；周总理日日夜夜接见各地造反派，苦口婆心劝解矛盾，疾呼“抓革命促生产”，他在孤身奋战……。我曾痛心疾首地为这个“文革”自毁江山、自毁长城而痛哭，到认清这是“最高统帅”的有意而为。我认定“文革是一场大劫难”，相信这样的倒行逆施不可能长久，历史将会给出答案。可是，我也悲哀地看到“它对中国的摧残，它留下的后遗症，一百年也洗刷不清。”我不计后果地写下所有的想法。这仅仅是“思想”，我没有向任何人散布过这些想法，难道由于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就是犯罪吗？当我能够不加掩饰痛快地（虽然是被迫地）说出所有的疑虑和见解，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畅快。禁区突破了，思想解放了，反而心中的压抑解除了！我感觉自己浴火重生！这是劫难带来的境界升华，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是一生最宝贵的经历。心里没有了恐惧，甚至也不考虑还有什么在等着自己。

每日上交“交待材料”，总计不下百篇。说来也奇怪，待我“反动思想”挖掘殆尽，当我准备迎接未知的惩罚的时候，我却被宣布“解放了”！通知我“回到革命队伍，应当将功赎罪，积极参加运动。”“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这是什么政策？令我迷惑。

近来，看到朱柏生同学写的文章，提到周总理亲自对科大运动有过一个批示：“中国科大的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他们还不会游泳，呛了几口水，现在是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不是整他们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批示，令人惊喜！也许，真是当年周总理解救了科大众多有思想有见解的青年学生和教职工；也许是执政的南航及12军军代表具有政策水平，放过了我们这些“思想犯”。如果处在其他单位，像我这样的“反动思想犯”早会有下狱或被枪毙的可能性。我是劫后余生，想来后怕呀！

九月初学习班结束，回到合肥的家，见到久别的公婆和思念的孩子。可怜我那刚刚九个月的小儿子原来圆胖的笑脸变成尖瘦的小脸，他竟然一下就认出妈妈。我搂着两个孩子，不禁泪流满面，挨整以来，第一次哭了。

我要感激老年的婆婆！她与我们一起承受了苦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她默默承担起抚养我的两个幼儿同时照料卧病不起的老公公的重负，此后她却从未向我诉说过当年的苦。

回校以后，我鼓起勇气，找到系办公室，向军宣队代表王能平状告淮南学习班的领导丁队长，反映他以找我个别谈话之机的非礼行为，以及他与一些女骨干份子的不严肃关系。不久，这位丁队长就离开科大了，是否与我的举报有关，不得而知。

到70年秋，开展了文革以来第二次“整党”运动。虽然我在学习班过关了，整党却过不了关。我常常只有在孩子们熟睡以后，半夜起来，写下两万多字的“斗私批修”自我检查。在整党会议上做了近两小时的自我批判后，没有迎来更犀利的批评，但是不能通过“恢复组织生活”，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挂”起来了。其间，开过多次党支部会议讨论我的问题，但是我无权参加。不少同情我的好朋友们与几位坚决要处理我的人意见相持不下。

有些同事事后奚落我说：“你真傻，你干嘛承认呢？”还有当年顺风顺水的人说：“其实我当时对江青也有看法呀！”可能我真是傻，对政治的险恶没有认识，没有经验，我就是我。无论如何，我说的是真话，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

在71年初的寒冬之际，毛主席“最高指示”要进行“拉练”，我们教工队伍半个月行程七百余里。我再次抛下幼儿，与方树尧等人担任宣传员，在队列之外跑前跑后鼓舞士气。所到之处，极目望去，赤地千里，没有一棵树木；所到村庄，一贫如洗，少见妇女儿童，四十几岁的男人就被称为“老爷爷”；忆苦思甜会上，老百姓向我们讲述“两次大动乱”之苦。

当队伍路经寿县农场十几里处休整之时，我请假去农场探望久别的丈夫。只见他穿着破棉衣，腰中系一根麻草绳护暖。他被分配在名符其实的“老牛队”，与老牛做伴：早春二月冒着冰茬和老牛一起下水田耙地，夜晚趴在老牛肚子上取暖；秋天，驾着老牛打场，跟在老牛屁股后面，一旦它拉屎便用双手捧着接屎，以免弄脏谷物；同时“老牛”是“批判对象”的代名词。他也曾与刘达老书记同室而居，入夜打点儿白薯酒就着花生米二人对酌，也常常偷“参考消息”来让老书记看点新闻。因为对他的批判尚未结束，我们不便随意交谈，只能淡淡地相互告别，匆匆离去。

直到1975年，党支部的一次会议让我参加，显然是要对我做出最后的处理意见。王能平主任亲自出席了会议。有些党员同志们表示：没有听到过王裕群的不良言论，只知道对她扣上的一些大帽子，却不知道她的具体反动思想言论是什么，不好表态。王能平发言讲“她的问题是反对文化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当即发言表态：“我希望将我的交代材料发给同志们传阅，以便让大家了解我的问题所在。其二，我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可能与王能平主任的概念不同，我认为周总理、陈毅、叶剑英等老帅们才是真正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他们当然不会将我的交代材料公开出来，那将使“反动流毒”扩散，而我提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也是大多数同志们认可的。这次会议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不久以后，当时党支部书记通知我说：“已经同意恢复你的组织生活。但是，要给你做一个结论，有如下三条：1.不能正确对待父亲被审查的问题，立场不坚定；2.对毛主席感情不够深厚；3.对周总理感情深厚。你是否同意？”我想了想，回答：“你们这样说，岂不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为什么把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立起来，这是说不通的。”他说：“如果你不同意，也可以不写结论。”我答：“那就不写吧！”

我还要求：“将从前我写过的交待材料全部归还给我！”那可是我以生命为代价写出的真实见解，是历史的见证。可是，有关人员告诉我：组织研究决定，运动中所有的交待材料统一烧毁，既不能归还也绝不保留。

销毁材料，就是销毁了证据，即湮灭了被整肃对象被迫害的证据，也销毁了造反派迫害群众的证据。这一段历史便难以考证了。

令我自豪的是，1976年，在周总理去世的日子里，我和丈夫双双率先戴上黑纱，以致全校响应，使三孝口一带的布店黑布售罄。我们积极参加自发组成的哀悼周总理委员会，策划全校行动。校广播站、图书馆、各系教工学生热烈响应，成功举办了“纪念周总理生平展览”，为总理设灵堂，并违背上级指令，公开举行了全校师生的追悼大会。在会上，钱临照老先生和我代表教工发表演说，我的悼词对总理表达深切怀恋，引发全场震天的恸哭，在悼词中仍然隐含着对中央文革派的挑战。

#### ◇ 我系教职工“反革命小集团”

淮南学习班最重要事件应该是打击“反革命小集团”，对这个小集团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我到学习班前，就已展开了。

被打成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我记得有七八个教职工：张××、林××、栗××、汪××、苏××等（没有得到过他们认可，我不便写出他们的名字）。这些教师多数是在60年前后从其他大学调入科大的，比我们首届毕业生年纪大四五岁，应该是经历过反右斗争的。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大多是“逍遥派”。无事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打桥牌，打扑克。此间，当然免不了闲谈对文革的看法。

不知道起因是什么，据说是一位姓苏的实验员开始突破的，讲到这几位老师有过“反动言论”。这样一来，这些同事逐渐一个个被牵涉进来。学习班的领导们显然经过精心策划，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手段：把这几位教工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小组，各个击破。最为常见的手段是，首先“打态度”，摆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后果；然后，采取“诱降”、“诈降”手段：“我们早已掌握了你的情况，你想的什么我们都知道（这已经令人感到他们在运用唯心论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老实交待，给你一条生路！”，或者“你们的同伙某某已经把你的问题揭发出来了，你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摸不清别人会说出什么来，于是不得不编造不着边际、莫须有的“罪行”，即使如此，革命闯将们还不放过，于是“逼供”越来越升级。

有一天半夜两点，尖利的哨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招呼全体学习班成员起床，批斗“反革命分子”张××。只见张××被勒令站在二百瓦大电灯泡下烤着，无数飞虫绕着灯泡和张××满处乱飞。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要张××交代什么问题，总之不少人挥舞拳头大声喊叫，张××也不知所措，总是答非所问。这样折腾了好几个钟头才收场。这种策略，不知是谁发明的！

我在“被解放”后，见证过对我组成员汪××先生的攻关过程。汪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语、非常老实低调的同事，显然他被“打”得蒙头转向，只有试探着猜测“说什么才能让造反派满意”，所以久久不能过关。

据我后来听说，他们越交待越离谱，最后上升到“要越境”、“要搞枪”。这些胡编出来的狂言，令造反派们兴奋不已，认为获得极大成果。

我不知道后来有关方面对这些被“逼供”的同事们是如何定性、如何平反的。凡是遭遇过这样经历的人们，心灵上受到的伤害是不会被遗忘的。

#### ◇ 寿县农场的一位女士

寿县农场是科大“一分部”行政人员的驻扎地。我的丈夫当年算是一分部工作人员，他在1970年初到达合肥不足一个月时就被勒令去农场参加运动，而后于1972年被派往定远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到1973年初才回合肥。他告诉我一些农场的运动情况，讲到一位传奇的女士陈淑慧。

陈淑慧是曾经教过我们“原子物理”的江书定先生的夫人。不知她的问题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她成为一分部首要打击对象。而在长达三四年时间里，她没有屈服过。

她白天受批判，还要参加劳动，到晚上，她几乎不睡觉，连夜写大字报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数千字，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就会看到她新贴出来的大字报。这样处于亢奋状态，不服输，不认罪，一直持续很久。有意思的是，当林彪出事之后，报纸上对林彪的报道减少，但是并没有向大众传达，只是党内后来秘密传达。陈淑慧很敏感地发现这种情况，她及时贴出大字报，说：“警惕目前有反林彪副统帅的动向！”这张大字报让人们很尴尬，难以回复，又无法告诉她真相，陈淑慧就借此话题不断出击。

大约已经到了72年，对她的斗争一直没有结束。由于陈淑慧“负隅顽抗”，有一天她被揪回合肥，召开全校大会，声势浩大地批判她一人，打击她的嚣张气焰。我所在的位置比较靠近舞台，清楚地看到两个男士抓住她的双臂，压着她做“喷气式”，其中一位竟然是我系的干事（我很诧异，陈是一分部的人，与我系无关，他为什么这么积极地主动去充当打手呢？）。为了防止她挣扎、出声喊话，在她的脖子上勒了一根绳子或铁丝，她被勒得舌头半伸出唇外。由于批判会时间很长，陈淑慧被折磨得终于瘫倒，几乎休克，他们不得不用一辆铁皮两轮车把她送到卫生所去了。

据说，后来她被送往南京的医院鉴定，证明她患有“精神病”，才放过了她。

#### ◇ 结语

我相信，人们对于苦难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在苦难中得到的教益是最深刻的，苦难是人生一笔最重要的财富。我根据自己的记忆，记录下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的这些事实，可以作为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缩影。

由于本人当时的处境，无法了解全部真相，更不了解背后的细节。而今，又无法找相关人士核实。如果文中有不准确、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请当事者纠正或补充。

在此，对过去所有以各种方式关照、帮助、同情过我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永远衷心的感谢！也对在执行政策中，对受害者网开一面、良知未泯的工军宣队同志们表示感谢！那些参与批斗的当年积极分子们，相信他们能够反思，吸取教训。

2017·8·5于加拿大

□ 摘自《我们心中的科大》，2018年9月

~~~~~  
【拒绝遗忘】

不可重踏历史覆辙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序二

• 印红标 •

这是二十位北京大学校友的文化大革命回忆文集，讲述了文革期间他们在北大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计划在2018年春天，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庆典之前出版，作为向母校的汇报，也可以算是献上一份非同寻常的纪念。这本书提醒人们：北京大学不但有其辉煌的历史篇章，也有过真真切切不堪回首的一页。对于智者，教训是一笔财富，其分量不亚于成功。著名的北大学者季羨林先生就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争取到出版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备受赞誉。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看重北京大学的影响力，始终将北京大学置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从运动之初被盛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引起中央最高领导层截然相反评价的6月18日批斗事件，派工作组与撤工作组，文革后期推广到全国的“六厂二校”经验、奉命撰文引导舆论的“梁效”大批判组，北京大学经历了太多牵动全国的事件。更不用说对于学校领导、教授学者、教职员工、普通学生的非人道迫害。正因为如此，社会期待北大的当事者、见证人能够讲出亲见、亲历，还原自己所知道的那些场景和卷入者的心态，揭示历史的真实，澄清不实或不够准确的说法。这是北大人的责任、也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在中国内地被长期压抑着难于展开。客观地说，清华校友率先行动，走在前面，北大人自应当仁不让，至今已经有几本回忆录在美国、港、台或自印出版，告诫世人：不可重踏历史覆辙。这本回忆文集是冲破羁绊，作出的又一个努力。

本书收录的回忆文章，涉及到几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例如：1967年聂元梓赴沪串联的幕后指使、翦伯赞教授遭受迫害含冤自尽的某些细节。也有作为学生对文革中错综复杂矛盾的观察以及对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梳理。这些回忆为北京大学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不可变更的，而人们的记忆是主观的，难免受到个人情感、后续经历的干扰；历史事实是多面的，而亲历者个人的见证是单面的。尽管如此，回忆性文章常常能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文字资料未曾涉及的重要信息，多人的回忆汇集起来，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或纠错，有助于像拼图一样还原历史的真相。

这本回忆文集的作者多为文革运动初期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他们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渐感到了困惑甚至遭到伤害。他们有的讲述了派性斗争令同学之间反目，有的回忆了亲去外地，为在派性冲突中被害的同学收拾遗骸的痛苦经历。有一篇文章记录了一位同学被调去协助《红旗》杂志调查“五一六兵团”，卧底参加其几次活动，向中央作了汇报。不想后来中央却无视事实，将数以百万计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那同学自己也成了“五一六”的嫌疑，阴影伴随一生。这些校友的燕园岁月被文革扭曲、摧残，正如一篇回忆文章的标题所说，成为“被亵渎的青春年华”。

阅读这些回忆，人们不免感慨：是什么使这些从全国选拔出来进入顶尖学府的优秀青年学子陷入了如此的狂热、愚昧，以致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时不胜唏嘘愧疚？事实上，当年不仅是学生青年，而且是全民的迷失。长期的学校和社会教育，把领袖捧上个人崇拜的神坛，引

导青年对“大救星”、“红太阳”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很多学者早已指出：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的愚昧化合二而一，是酿成这场悲剧的一个基本原因。文革结束之后，全民反思，中共中央痛定思痛做出不要突出领导个人、不搞个人崇拜的决定，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当今回顾文革浩劫，以史为鉴，尤感遏制个人崇拜，坚守思想自由、理性批判精神的必要。

本书作者均为本人的学长，他们排除阻碍，勇敢、坚决地向母校的青年一代、向社会讲出他们的文革经历，即使在国内不能，也要在海外出版，表现了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令我十分感佩和深受鼓舞。主编王复兴学长嘱我写一段序言，实在令我有不敢当之感。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也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防止文革资料流失和文革研究领域在封禁中荒芜，为了不走回头路，不揣谫陋写下这段文字，期待推动更多的回忆和反思面世。

2018年3月5日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主编：王复兴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